

篡权，两位改革的主要人物的身份地位也不同，但为什么他们都结局悲惨？作者认为他们都触犯了阶层利益是他们结局惨淡的主要原因，根据书中的论述加之笔者的思考，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思想控制”的不稳定性。

秦孝公死后商君自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变法时期触动了宗室贵族的很多利益，虽然他本人承受很多的恶名，但是秦朝一统天下后，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变法才取得的成果。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维护统治的特点就是依靠强权和刑法确立起政治权威，但是经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加上西周时期分邦建国的宗法传统，实际上各个封国都形成了独有的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秦朝借助商鞅严酷的法律是秦国一跃而起。商鞅变法虽然为秦朝带来了现实利益，但是它没有产生社会的政治认同，尤其是统治阶层，社会上人人自保，畏惧之心远远超过认同心理，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思想传统的背景下，转变思想观念是很难做到的。而王莽却极度迎合统治阶层和下层民众的思想，主要在于武帝时期儒学正统地位后产生的政治效能，王莽借谶纬神学附会儒家思想，树立起来神化典型的大儒形象，其实，面对衰、平之际的政权真空状态，即便不是王莽，也会有其他人颠覆政权。只不过王莽看到了民众期望的天子形象，加之他手中权利的集中，所以顺应了历史演进的趋势，他借助思想认同妄图推行一系列改制运动，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结果显而易见。

三、贯通古今是一种启示和思考不是评判标准

古代社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社会矛盾究竟是什么？我想任何人不能阐释清楚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朱永嘉先生“改革不能唯上、唯书，只能唯实”^①的说法确有道理，但是将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与当今联系的有一些生硬，古代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加、十分复杂，我们作为第三视角来看待已经发生的历史都无法判定，何谈几

千年前的古人？

巫蛊之祸使戾太子含冤而死，导致后来王朝形成了皇帝年幼外戚和宦官干政的政治局面，元、成之时，众多灾异专家既熟悉儒家经典，又掌握数学知识，企图在儒家礼制的制约下进一步神化君权，防止外戚专政超越皇权，难道他们的做法也是颠覆政权的罪魁祸首吗？可见，朱先生的评判标准很难说明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商鞅作为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他留给后人的是他勇于突破旧制的精神，和敢于碰触既得利益的勇气，从这一点看，商鞅死得其所；王莽改制中虽然有很多复古思潮，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很多超越当时社会的理想内容，向往西周时期的生产生活状态难道在当时社会真的被所有人抵制吗？我们不能代替古人的看法，只能尽可能接触历史真相，他们具体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全面窥探的。所以作为一名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学术与政治观点不应该混为一谈。

总的来说，朱永嘉先生的这本著作涵盖了思想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很多方面，能看到他本人学术的功底，在史料的运用和语言的凝练方面都值得笔者学习，以上观点都是笔者浅显的思考，由于能力有限可能有很多不当之处，望评论指正。

参考文献

[1]朱永嘉.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8:193.

注释:

[1]陈锋.留心朱永嘉们,广东:同舟共进,2010(06):37.

[2]曾彦修.天下谁人不识君——再吁留心朱永嘉们,广东:同舟共进,2010(08):22.

[3]金光耀.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广州:开放时代,2015(03):205

论抗战时期四川省电话业发展

赵博

(定西市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随着抗战的爆发，国府西迁，四川由此变成了抗战的大后方。随着大量人员、物资、设备的内迁，这也为四川的电话业创造了机遇，因此需求与机遇促成了四川电话业的发展，并随之带动了电话业的业务等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关键词】四川；抗战时期；电话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6.1159

抗战开始后，随着沿海东南部的失陷，电话业或被敌占或被战争毁坏。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西迁后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通讯网。在积极寻求新线路和建设区域的过程中，作为抗日大后方基地的四川尤为政府当局所重视。

一、战时方针的转变

抗战期间，由于战局的紧迫和电信在军事、民用上的极端重要性，迫使国民政府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战时电信建设的各项任务。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新的电信建设指导方针：1.精神与物质并重。2.破坏与建设并进。3.以人力补救困难。与此同时，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交通部也提出了电信建设的具体目标：（1）构成西南西北之通信网：以有线电为主，无线电为辅，报话并重；以后方省会及重要都市为中心，由此分布次中心及小中心至个别单位，为初步通信网系；以与后方各省全部联络为最后目标。（2）完成前后方之军事联络设备：架设富有弹性之长途报话线路，须能随军转移，并备辅助线路，以应紧急需要。（3）构成防空情报网：以各空军根据地为中心，划分纵横方区，设置监察纵队，利用有无线电与各中心联络，以防敌机轰炸。

二、建设重心的转移

国民政府深知后方通信的重要性，在全面抗战刚开始不久就要求交通部将储存的电信材料向西转移。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将加强战时后方电信建设提上了日程。随着西南、西北不久便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电信建设的紧迫性更加明显。1938年交通部提出：“查全国长途电话网及无线电网，向以首都为出发点，由南京逐渐推行至西南西北各省。近两年来，虽经积极筹设，但大都偏重于中干部分，而川、滇、黔、桂、新、青等省联络线路，因时力财力所限，尚未能普遍。惟自抗战发生，局势转变，西南西北已成为抗战根据地及国际交通线路，关于通信设备，自非急谋改进，不足以应需要。”同年6月交通部拟定的交通建设方案中，有关电政一项计划，提出西南西北地区共需扩充一三二二六公里电信线路，才能满足战时后方电信需求。

三、统制政策的出台

抗战期间，作为通信利器的电信业与其他交通事业一样在国防军事上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继铁路、邮政等事业相继实行国家统制后，1938年6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非常时期全国电信统制办法》，共有十九条，其主要内容为：

（一）报话局所人民无论国营、省营、民营均应随军进退，不得擅离职守。

（二）报话局所人员凡能恪守尽职者，给予奖励；凡擅离职守，不听命令或受敌利用充任汉奸者，应予严惩。

（三）凡军事区域内之电报电话局所，须将营业状况，人员、机械、组织情况等每隔两星期报告各该省通信指挥部及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备查，而后者有直接指挥该区内所有报话局所之权，并得派专员负责在两者之间联络。

（四）报话局所及主要线路须有适当防空设备，并筹设备用局，唯须经得各地通讯指挥部及最高军事机关同意；至于军事机关及其他重要机关之电信建设更应妥为筹划，以防原有线路破坏时通信之中断。

（五）报话局所须成立抢修工程队，并先期储备充分材料，以便线路被破坏后

得随时修复。

（六）报话局所之机件，在必要时，须经本区通信指挥部及最高军事长官允许后，才可撤退，但移设地点后，仍须继续通信。

（七）各区负责联络或监督报话局所之专员的服务细则则由各区通信指挥部及最高军事机关自行拟订，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

四、监督体系的强化

抗战爆发后，交通部鉴于“整顿及发展电政起见”派赴各区电信巡查员。电信巡查员随时由各局派赴所辖各局巡查。嗣后，为了更加规范电信巡查的行为，于1938年8月11日公布：“各电政局电信巡查员服务规则及电信巡查员选送报告须知两种。”

电信巡查员的职责是一种纽带作用。“除巡查电信机构外，并访问当地行政机关，详细对本地电信办理情形是否满意及有无意见，以便参考改进。”至1940年底，各省电信巡查员以巡查之局所，川康藏计为10处。

交通部对于电信巡查员的巡查能做出及时的回应，进而对各地电政发生效应。“就巡查员报告内查实纠正之事实及本部与各管理核示，改善之各点，当以对电政发生效用。”

由此可见交通部将电信巡查员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不但是信息的传递，反馈的工具，可以使各地之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地回馈，而且也是其政策及时作出调整的工具。

其次，在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也特组织了建设行政督导团，赴各地市县督导建设，就地解决各县困难。前后共组织了数次，第一次于1940年开赴各地。

其主要职能为：“搜集各地各种资料，能使平时所拟之计划规章能切合实际需要。”当时电话业作为一项建设事项，也是其督导的重要内容之一。“每赴一地，电话均在考察之列。”例在资阳“a电管所工作尚佳，b请动用临时费，c整修资成专线案，已于两三月发出呈文，至今尚未奉批。”在简阳，“a电管所工作正常，b请不裁人，c请增加经费。”

五、促进电话业发展的外来因素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以及武汉失守，国民政府确定四川为大后方基地，大批机构，工厂、学校开始内迁，为电话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重庆，四川对大批内迁的工厂、机关、学校和人口提供了较为安定和安全的落脚点。

内迁工厂入川者最多，1939年6月迁川滇湘等省的工厂300家中四川占44%。1939年8月在合计472家厂矿中计四川有382家。到1940年底迁川工厂达254家，占内迁总数的57%。其中90%以上分布于川东，靠近巴县，重庆一带。迁到川西的较少。同年底沿海工厂内迁的在后在大后方形成11个工业区，其中四川就有5个。

参考文献

[1]范锦明.《中国国民党和经济建设》.国民党与中国丛书之三.南京正中书局,1943年

[2]何承朴.《成都夜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